

新潮



“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陈平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301-25499-8

I. ①新…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7883 号

书 名	“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著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499-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257 千字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这不是一部体系完整、首尾呼应的专著，而是作者二十年间某一专题的文章结集——选择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至于谈论“新文化”，为何需要兼及晚清与五四，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导言”中已有详细论证，此处不赘。

十三年前，我与日本大学山口守教授合作，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开幕式上，我曾提及：“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且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此文之所以需要副题“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就因为涉及我1984年进入北京大学随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很快意识到北大学者之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最具史的意味，“这与他们很早就走出自家书斋、浸泡于图书馆的旧报刊室大有关系”。考虑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在小说研究中比较容易得到落

实，我最初的两部著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也曾切实有效地讨论了报刊生产过程以及报刊连载形式对于作家写作心态、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的影响。

虽然从未撰写过报刊史方面的专门著作，但我长期关注报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学术趣味，在相关著作中不时有所表露。正是基于此私心，我选择在进京念书三十年这个特殊时刻，盘点零篇散简，凑成一册小书，交给北大出版社，约定明年春夏推出，以纪念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杂志《新青年》（1915—1926年）创刊一百周年。

在我已刊各书中，涉及不少晚清以降重要的报刊及书局如（如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期3期及2003年1期，收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曾获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的《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若系统梳理，容易与以前的著作重叠，念及此，采用“拾遗补阙”的办法——不动我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学术著作，而从其他随笔集中截取四文，加上未入集的九篇，编成这册纪念性质的小书。

编辑此书，最初是基于“公谊”——纪念《新青年》创办百周年；可编着编着，越来越偏向于“私情”——爬梳每篇文章的写作过程，追忆问学路上师友们之援手，实在是感慨万千。

书中写作时间最早的，当属“1993年11月8日于东京白金台”的《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类型特征》。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我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在东京大学及京都大学从事专门研究，邀请者是东大文学部藤井省三教授。在日期间，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彭小妍研究员筹备国际会议，邀我参加。那时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尚未正式开启，我此前多次申请赴台，都被有关部门友好地拒绝了。藤井教授建议我试着从东京飞台北，结果居然办成了。这是我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活动，遇见不少旧雨新知，还顺便参访了父亲早年工作过的《中华日

报》社，故印象特别深刻。

《气球·学堂·报章——关于〈教会新报〉》一文，虽署“1997年11月25日于〔北京〕西三旗寓所”，真正得益的是此前半年的美国之行。1997年3—7月，我与妻子夏晓虹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基金的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邀请者是王德威教授。不用上课，除了偶尔外出演讲及游览，主要时间是泡图书馆。出于好奇，我逾越自家专业范围，仔细阅读了哥大东亚图书馆收藏的影印本《教会新报》，做了不少笔记。回到国内，整理成这篇此前很难入集的文章。

《以“图像”解说“晚清”》是我和夏晓虹合编的《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序言，写作时间标注颇有玄机——“2000年10—11月于海德堡/东京”。因撰写此文时，夏晓虹在东京大学客座，我则应瓦格纳教授（Rudolf Wagner）的邀请，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2000年10—12月）。得益于刚刚熟悉的互联网，我们每天交流读书心得及写作进度。此书序言我写，注释归她，因即时对话，实际上早就“互相渗透”了。

《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是录音整理稿，不同于专业论文，读来别有一番风味。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我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客座，邀请者是梅家玲教授。为本科生及研究生讲授的专题课“晚清文学与文化”，因台大学生录音整理，于是有了《晚清文学教室——从北大到台大》（梅家玲编，台北：麦田出版，2005年）这么一册奇书。这里选录2002年9月25日在台大文学院演讲厅的第二讲，以纪念那次奇妙的讲学经历。

《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原本提交给台湾中正大学主办的“文学传媒与文化视界”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文章刊出时，我刚好应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邀请，在巴黎的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学（2004年2—6月）。约定讲授两门课，基础课是中文写作，专业课一

半讲余华小说（对方指定），一半自由发挥。这自由发挥的半门课，我讲了这篇文章以及其他几篇相关论文。何碧玉教授很开心，于是请丈夫安必诺教授（Angel Pino）合作，编译成《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化七讲》（*Sept leçons sur le roman et la culture modernes en Chine*, LEIDEN ·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5）。

《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是为我和米列娜合编的《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撰写的“代序”。组织一个国际团队，研究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发起人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著名的捷克汉学家米列娜（Milena Doležalová-Velingerová, 1932—2012），而最终顺利完成，则得益于瓦格纳教授的鼎力相助。故今年春天出版的英文书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4)，署米列娜、瓦格纳合编。为此英文著作，我只贡献了中文本《晚清辞书及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可在长达十年的合作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欧洲学者治学的认真与严谨。两次工作坊（海德堡大学，2006年3月；台北：中研院，2007年10月），加上无数的电邮，不断的打磨，方才成就今日这本英文书。相比之下，匆促问世的北大版，只能说是“初稿”。

《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乃不久前贵州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的“导读”。文末称：“为重编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撰写‘导读’，对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写作时间拖得太长，学界不断有新成果面世，等到自己出手时，只好删繁就简，以回避‘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困境。”2006年底交出重编本目录，而后便开始撰写这篇“导读”；之所以写写停停，除了学术兴趣不断转移，更重要的是，2009年秋季学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专题课，在与研究生深入交流的

过程中，调整了写作策略。虽有此波折，我很怀念那师生间如切如磋的温馨场面。

此书有四文选自仍在市面流通的随笔集；日后旧书重印，将据此重新调整篇目。至于我谈及大众传媒的大小文章，散落在各评论集或随笔集中的，还有《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中的《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怀念“小说的世纪”》，以及《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中的《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学术文化视野中的“出版”》《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等，敬请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2014年9月13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目 次

序001

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001

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025

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050

气球·学堂·报章075

以“图像”解说“晚清”096

作为“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130

学问家与舆论家159

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169

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190

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242

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类型特征257

作为“北京文学地图”的张恨水小说278

20世纪中国文学纪事（上篇）288

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1]

——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

假如你想在悠远漫长且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史上，迅速抓住“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该从何入手？表现现代生活？独尊个人意志？借鉴域外文学？这些固然都是好主意；可我更愿意从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说起^[2]。这里有1980年代中期起陆续引进的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媒介研究、公共空间等西方理论的影响，但更与北大学术群体的趣味有很大关系。在《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3]，我主要谈论师长们的工作；至于年轻一辈的研究成果^[4]，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1] 本文原是提交给“文学传媒与文化视界”学术研讨会（台湾，中正大学，2003年11月8—9日）的专题论文，后又成为笔者在鲁迅文学院（北京，2003年11月28日）及厦门大学（厦门，2004年1月4日）的讲演稿。此次收录，以论文为主干，“附记”部分乃北京演讲时的借题发挥。

[2]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附录一《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此书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1990年由台北的久大文化公司推出繁体字版，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将其收入三卷本的《陈平原小说史论集》，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

[3] 参见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

[4] 参见陈平原、山口守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其中有不少北大刚毕业或仍在学的研究生论文。

谈论文学的生产及传播，在我看来，起码必需包含报章、出版、教科书编纂以及读者研究等四个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侧面。前者边界明确，容易获得共识。后两者或牵涉教育体制，或定义相对模糊，有待进一步厘清。^[1]对于一时代文学趣味的形成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后两者关系重大。^[2]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讨论报章在晚清以降的“文学革命”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1] 去年11月8日，在台湾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召开的题为“文化场域与教育视界——晚清至1940年代”国际会议上，我曾区分不同类型的读者：“在我心目中，有两种读者，一种是一般读者，其购买与阅读，乃纯粹的文学消费；另一种则是理想读者，不只阅读，还批评、传播、再创造。如果举例，前者为上海的店员，后者则是北京的大学生。讨论文学传播，除了考虑有多少读者，还必须考虑是哪些读者在阅读。大学的课堂讲授，集体住宿制度，还有社团活动等因素，使得同样一本书，卖给店员与卖给大学生，传播的广度与速度是不同的。因此，我才会特别强调《礼拜六》与《新青年》的读者构成不同，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现在讨论大众文化的人，经常会举这么一个例子：当年张恨水的读者，比鲁迅的读者多得多。可这说的是短时间内某部作品的印刷与销售，我想提醒一点，张与鲁的读者素质不一样，后者有批评、转载以及模仿写作的可能。”参见《文讯》2003年1期颜健富《现代性与中国启蒙运动》。

[2] 在《“通俗小说”在中国》一文中，我曾提及：“五四时期的大学教授，除了社会地位与知识准备比较优越，其从事文学创作，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那便是借助于讲堂讲授与教科书编撰，使其迅速传播。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在北京大学所作关于小说的演讲，为新文学发展推波助澜；而《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之源流》等著述，更是借总结历史张扬其文学主张。1929年，甚至朱自清开始在大学课堂上系统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虽因受到很大压力，四年后关门大吉；可历史上难得有如此幸运的文学运动，尚在展开阶段，便已进入文学史著和大学讲堂。更能说明五四新文学格外幸运的，还属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1920年1月，教育部下令各省‘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这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自是关键的一步。而迫在眉睫的编写新教科书，更使得新文学迅速‘经典化’。……新文学家的作品可以轻易进入中学教科书，而‘通俗小说’家名气再大（如张恨水），也没有这种缘份。”（参见拙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99—119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一、报章之于“文学革命”

梁启超、谭嗣同等晚清文人所谈论的“报章”，包括报纸与杂志。落实到文学生产，则是报纸副刊、文学杂志以及刊载文学作品的综合性刊物。一般说来，因篇幅及读者定位不同，专门杂志与报纸副刊的面貌应有很大差别^[1]，可具体到刊发诗歌、散文（杂文、随笔）、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二者的功能大致相同。连中篇小说《阿Q正传》都是初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1927年起连续五年连载于《世界日报》，你就没有理由在此二者之间强分轩輊。

专门的文学杂志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礼拜六》《小说月报》《创造》《语丝》《新月》《现代》等，固然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文学进程，但综合性杂志如《新民丛报》《新青年》等，其功用同样不能忽视。至于报纸的副刊，名目繁多，涉及范围甚广，但仍以文艺副刊的影响最大。这一点，报学史专家戈公振有很好的说明：“吾意副张之材料，必以文艺为基础，如批评、小说、诗歌、戏曲与新闻之类，凡足以引起研究之兴味者，均可兼收并蓄，而要在与日常生活有关，与读者之常识相去不远。”^[2]

谈论报章与文学，为何从1890年代说起，而不是像新闻史专家那样，将其推到1810年代？我们都知道，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马六

[1] 戈公振撰于1927年的《中国报学史》第六章第九节“附刊与小报”称：“日报与杂志，只供人以趣味，研究学问须用书籍，此通论也。然我国杂志不多，专门之杂志尤少，于是周刊又兼有一部分之杂志工作。关于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乃几无所不包。然二者性质终属不同，盖专门杂志务求其深，周刊务求其广，且须力避教科之色彩也。”（《中国报学史》201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

[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200页。



《海上奇书》

甲出版了第一个中文的近代化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而中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纸，则当推伍廷芳1858年于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但真正将文学创作作为报章的重要栏目来认真经营，有待报纸文艺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中国最早的文学杂志《瀛寰琐记》创刊于1872年，其中除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听夕闲谈》外，余者都是传统诗文。1892年韩子云独力创办《海上奇书》，主要发表自己的长、短篇小说，再配上一些前人的笔记、小说，方才对日后的文学革新产生影响。而1897年上海《字林沪报》设副刊《消闲报》，日出一张，随报分送；1900年《中国日报》辟副刊《鼓吹录》。此后，大部分报纸都腾出固定的版面刊载文艺作品，“副刊”之于“文学史”，方才构成重要的关系。

说到“文学革命”，一般指称五四新文化人的工作，具体年代是1917—1922年。经由胡适《五十年以来中国之文学》及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述，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只是随着晚清研究的迅速崛起，梁启超等极力提倡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等，逐渐被纳入“文学革命”的范围来考察。在我看来，一场成功的思想、文化、文学上的“革命”，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稍纵即逝，必然包括酝酿、突破、巩固、定型。因此，我愿意将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文学事业，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来考察。这也是我所再三谈及的，无论关注文学运动，还是兼及思想学术，都必需意识到此乃晚

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合力。^[1]1935年前后,借助《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五四一代完成其自我经典化;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客观上也使得新一代作家占据主导地位并充分展示其才华。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提到自家创作《狂人日记》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2],这话必须与胡适“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感叹对看^[3],方才明白五四那代人的襟怀与抱负。不能只是“提倡有心”,必须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所谓的“文学革命”,才算是真正获得成功。本已分道扬镳的五四新文化人,之所以尽弃前嫌,通力合作,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便是为了向挑战者证明:五四文学革命确有“实绩”,并非只有“首倡之功”。

1933年,刘半农在编纂《初期白话诗稿》时,引了陈衡哲“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古人了”的慨叹,然后加以发挥:“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4]这段话,被《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者再三提及。“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样的感慨,既沉重,又敏感,牵涉到五四“文学革命”与1930年代“革命文学”的冲突。尽管代与代、先驱与后继、当事人与观察者、追忆历史与关注当下,决定了对于“新文学”的历史建构,各方意见会有分歧;但经由《中

[1]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第一章 导言”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导言 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

[2]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卷2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 自称对于新诗“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显然是在与周氏兄弟的接触中,意识到自己的局限。1922年3月4日的日记中,胡适记下鲁迅的期待以及自己的反省:“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

[4]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目》,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

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新青年》同人的文学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1]

关于五四一代如何借助“大系”的编纂,加强“文学革命”的历史记忆,并恰到好处地建立起有关“新文学”的权威叙事,学界近年多有研究^[2],这里不再细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些人事变迁,同样影响后世对于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学的记忆。《独秀文存》《守常文集》的出版,刘半农、鲁迅的逝世,《新青年》杂志的重刊等,都使得抗战前夕形成一个追忆《新青年》的小小热潮。此后,还有若干“《新青年》叙事”在继续(如胡适、周作人),但作为整体的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已完成其使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既有“左联”为代表的激进思潮,也有不少特立独行的优秀作家(如老舍、巴金、沈从文等)。后者大都延续五四新文化路线,可以看作晚清以降文学革命所结的“正果”;前者则力图告别/超越五四,另辟一番新天地——但其文艺大众化口号之得以真正实施,还有赖抗战军兴,整个文学生产及传播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换句话说,纷纭复杂的1930年代文学,既是晚清以降文学革命进程的终结,也可看作另一场革命的开端。

[1] 参见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3期、2003年1期。

[2] 参见刘禾“The Making of the Compendi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ranslingual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温儒敏《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文学评论》2001年3期)、罗岗《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开放时代》2001年5月号)以及杨志《“史家”意识与“选家”眼光的交融——〈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稿,2002年)。

二、以“报章”为中心的文学时代

十五年前，我曾这样论及杂志（尤其是小说杂志）在文学革命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首先，从《新小说》开始，每批作家、每个文学团体都是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其艺术主张”；“第二，不是出版商办杂志，而是作家亲自创办或编辑文学杂志”；“第三，这两代作家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报刊上发表后才结集出版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1]现在看来，这一判断大致没错，但必须略加修正。名记者兼小说家萧乾晚年之为报纸副刊“鸣不平”，其意见值得关注：“遍翻几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看不到哪位文学史家正视过文学副刊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起过的作用，做出的贡献。然而多少作家是在20年代、30年代，在北平的《晨报》、《京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开始写作的呀！”^[2]兼及报纸的文艺副刊与杂志（尤其是文学杂志），这样来谈论文学生产与传播，无疑更为合适。

1946年，沈从文为天津《益世报》编《文学周刊》，其《编者言》有曰：“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兴味和信仰。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太戈尔、爱因斯坦的学术讲演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之、丁文江等等重要论著或争辩，是由副刊来刊载和读者对面的。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

[1]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79—2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 萧乾：《〈中国报纸的副刊〉序言》，见王文彬编《中国报纸的副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新作家的出头露面，自由竞争，更必需由副刊找机会。”沈文的结论是：报纸副刊“直接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磐石永固，间接还助成了北伐成功”。^[1]这句话的前半截很有道理，后半截则不无夸张。报纸副刊读者数量众，社会影响广，就像郑伯奇所说的，五四运动以后，“副刊成了发表新思想，开拓新文艺的自由园地”^[2]。除了上文提及的1920年代“四大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晨报副刊》《京报副刊》，19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申报·自由谈》《世界日报·文艺周刊》等，也都曾在文坛上引领风骚。

为什么报纸的副刊（尤其是文艺副刊）如此重要，孙伏园的看法是：“而在中国，杂志又如此之少，专门杂志更少了，日报的附张于是又须代替一部分杂志的工作。例如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本来都应该有专门杂志的，而现在《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北京《晨报》的副刊，大抵是兼收并蓄的。”^[3]朱光潜则着眼于作家与读者的沟通：“居今之世，一个文学作家不能轻视他的读者群众，因此也就不能轻视读者群众最多的报章，报章在今日是文学的正常的发育园地，我们应该使它成为文学的健康的发育园地。”^[4]读者需要副刊，作者需要副刊，其实，更需要副刊的，还是报纸自身。有些连载（如长篇小说）目标很明确，直接指向报纸销路；有

[1] 从文：《编者言》，《益世报·文学周刊》11期，1946年10月20日；见《沈从文全集》16卷447—448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 参见郑伯奇《发刊的话》，《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副刊》第1期，1945年5月4日。

[3] 记者（孙伏园）：《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京报副刊》第1号，1924年12月5日。

[4] 朱光潜：《谈报章文学》，《民国日报·文艺周刊》1948年2月2日。